

以宽容的目光送王勇平离职

在铁道部的权力层级结构中,王勇平只是一个中级官员,并非掌控大局的人,希望他站在掌控大局的制高点上讲话,事事都给出圆满的答复,这个要求超越了他的“体量”。

>>头条评论

□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

王勇平离开了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岗位,虽然铁道部官方说这是一次正常的职务调整,但外界普遍猜测,这和在动车事故后那场引起极大争议的新闻发布会有关。

回过头来看,如果那场发布会的缺憾完全由王勇平本人担责,这对他是一种苛责。当动车事故发生后铁道部面临公信力危机的时候,无论谁来当这个发言人,处境都是一样的。

>>声音

银行内国家定价,银行外市场定价,于是,一夜之间“钱庄”遍地,炒资金成时尚。大型国有企业或上市公司参与“倒资金”将更可怕。

——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认为,价格双轨制在信贷领域复活。

日本的未来离不开与亚洲邻国的团结合作。日本要走出震灾的阴影,摆脱困扰多年的经济低迷,都离不开国家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。

——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高洪说。

有观点认为,人民币升值能够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,因此可以抑制输入型通胀。其实这个想法很错误,因为没有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,也没有国际外汇市场的汇率定价权。

——农业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说。

我们已积累了不少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,再加上这些年治理通胀的心得,遇上美国债信危机所带来的全球金融巨幅震荡,中国政府已用静心观察沉着应对替代了政策冲动,不会马上亮出政策的底牌。

——经济学家易宪容说。

有公有学校资源过剩,能不能够把这些资源借给民办学校,而不是简单将其解散,农民工子弟能不能健康成长,关系到社会未来能不能稳定和发展。

——时事评论员曹景行说。

摩托罗拉的结局,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局,无法挽回。我们无法用对错来衡量很多事情,只能说:别了,曾经伟大的摩托罗拉工程师文化;别了,曾经充满理想主义的工业化时代!

——有媒体评论摩托罗拉手机部门被Google收购。

对王勇平个人的表现提出苛刻的要求,而不是从他的处境出发给予必要的理解,这不厚道。那场发布会的尴尬,绝不是王勇平个人的能力和素养所能化解的,当时整个发布会内外的那种气氛,也不是他凭一人之力所能驾驭的,换了其他人可能会有相对从容一些的表现,但不一定不留缺憾,甚至可能留下更多的缺憾。王勇平在发布会上的表现,以及整个发布会的气氛,其实是当时事故处理进程的真实反映,他面临的压力,来自于事故发生后民众对铁路经营管理水平的质疑和谴责,也来自于铁道部在关键时刻对他

的期待,希望王勇平在内外双重压力面前一点毛病也不能出,这不合情理。

事实上,王勇平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通过语言、通过他的行为举止、通过他的表情和眼神传递给我们的信息,比那些“完美”的新闻发布会要多得多。王勇平在发布会现场的表现,极真实地反映了铁道部在危机面前的应对能力,而不是他个人的水平和能力。换个角度看,如果当时发布会的主角不是王勇平,而是一个所谓水平很高的新闻发言人,能把记者的问题回答得滴水不漏,不但不给铁道部丢分,甚至还能为铁道部赢些许面子,这

样“完美”的新闻发布会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吗?近一个阶段,王勇平的那场发布会,成为广受关注和议论的热点话题之一,有权威媒体批评他的发布会成了制造新闻的地方,还有人主动给他提供“场外指导”,帮他分析发布会失败的技术原因等等,其实,那些批评王勇平或者为他出主意想办法的人,如果代替王勇平去开这场发布会,表现也未必能比王勇平更好,就是“好”,也未必就是民众乐于认可的那种“好”。因此,对王勇平和他的那场发布会,不但不应该感到失望,反而应该感到庆幸,庆幸我们当时面对的铁道部发言人,不

是一个所谓职业素养极高、能把外交辞令操练到极致的人,这样的人带给我们的信息,会比王勇平更多吗?

对王勇平和他的发布会,脱离他的利益背景提出过高的要求尤其是道德要求,是极不现实的想法。很多批评王勇平的言论,其实暗含着一个前提,那就是希望他能摆脱自己所依附的利益主体,站到另一个利益主体一边来发言,这其实是不可能的,除非他是圣人,可惜王勇平不是圣人,我们每个人也都不是圣人,因此,对王勇平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,还是多一点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理解,多一点宽厚才好。

铁道部对王勇平岗位的调整没有过多的解释说明,因此,他的工作调整是否和那场发布会有关,谁也不好妄断。应该指出的一点是,在铁道部的权力层级结构中,王勇平只是一个中级官员,并非掌控大局的人,希望他站在掌控大局的制高点上讲话,事事都给出圆满的答复,这个要求超越了他的“体量”。

对于这场严重的动车事故,公众期待真正有人为此担责。而王勇平只是个新闻发言人,如果舆论的批评成为铁道部调整他岗位的理由,如果这种调整成为回应民意的一个举措,这是我们的期待吗?

怎么竟会有“街头犯罪”这样的罪名

自己都认为是犯罪,而硬要包装成“正义”去打压别人,事到临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

□甄言

进入8月,英国伦敦等多个城市发生社会动乱。英国政府出动上万警察镇压,逮捕超过2000名“罪犯”。英国首相卡梅伦誓言“对街头犯罪零容忍”,并委任美国打击“街头犯罪”的专家比尔·布拉顿为英国警方顾问,以应对城市“街头党文化”和大范围骚乱。

看到这样的新闻,令人大感不解。“街头犯罪”是什么罪名?“街头党文化”是什么文化?好像这只出现在西方国家的犯罪定义中,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同样状况,似乎西方政府和媒体

并不会用这类罪名,而是冠以“民主运动”、“反抗暴政”等;也决不会与犯罪扯上关系,而是穿上“民主”、“人权”的外衣,成为西方政府和媒体施压于别国的口实。

这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是非判断:凡是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动乱或事件,就是极端主义、暴力行为。而同样的事件发生在非西方国家,特别是中国,就得出完全不同的判断,就是违反人权,就是镇压“和平示威”。在中国发生的拉萨“3·14”事件和乌鲁木齐“7·5”事件,是不折不扣的暴力犯罪,造成了无辜平民的严重

死伤和财产损失,而西方国家和媒体却异常坚定地站在暴徒一边,指责中国政府维护社会秩序,还以“人权卫士”的嘴脸指手画脚地说教。难道卡梅伦的“零容忍”只适用于英国,而不是“普适”的?

最违反常理并不合逻辑的是,凡英国、美国、挪威等西方国家发生恶性社会事件,都被局限为偶发、非政治因素,或视为个案。即使英国多个城市动乱,也不能被称为政治动乱,而别国哪怕几个人的事件也会被上纲上线为政治制度问题。且不仅西方媒体和政府如此反复申明、加以引导,国内一些媒体

也鹦鹉学舌,帮腔开脱,全然成了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的传声筒,失去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和是非标准。难道忘了北京奥运火炬在伦敦、巴黎传递时西方政府和媒体的丑陋表现吗?难道忘了挪威诺贝尔和平奖的闹剧吗?中国媒体的立场应该是坚定、明确、一贯的,这就是实事求是,就是反映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。

是非自有公论。世界上的事情是繁杂的,国情和文化各有不同,但判断是非总要标准一致。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自己都认为是犯罪,而硬要包装成“正义”去打压别人,事到临头搬起石头砸了

自己的脚。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讲“普适”了?对别人一套,对自己则是另一套,“普适”不过是骗人的口号、皇帝的外衣。西方国家控制世界的资源和舆论,坐了几百年的顺风车,现在遇到困境,迭出洋相。美国自诩为最好的政治制度成了它渡过危机的最大障碍,尽显弊端。欧洲深陷债务泥潭,社会治理失效,如不改革难有出路。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,路是自己走出来的,走得正确不正确,要由历史和事实判断。今天的中国人有自信走好自己路,面对时势起伏,我们更加坚定。

(摘自8月16日《北京晚报》)

>>个论

应尊重平民的自我教育权

□王石川

两天后,是海淀东升乡打工子弟学校——新希望小学原定的开学日,而今,这处800多名孩子的校舍,只余下一地瓦砾。8月10日,因租房合同到期,新希望小学办校用地被东升乡科技管理站收回,校舍全部拆除。据了解,自6月中旬起,大兴、朝阳、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,涉及近3万名学生。(8月16日《新京报》)

相关部门关闭学校的理由,总是冠冕堂皇——打工子弟学校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。问题的关键是,农民工的孩子也不想在有隐患的学校里就读,但又该如何?打工子弟学校要符合要求比登天还难,按《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》的“基本标准”规定,校园面积至少要达到15000平方米,校舍总使用面积至少3587平方米,其中体育场地应当满足相应学校规模所需的至少200米环形跑道等。业内人士说,“这些条件,没有哪家打工子弟学校能达到”。

像打工子弟学校,他们在夹缝中倔强生存,作为平民的自我教育,既是农民工孩子获得新知的主要途径,也能为政府减少不少压力,是公立教育的有效补充。对打工子弟学校,相关部门不仅不应该关闭,更应该提供政策、师资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。

此前,“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”的感叹,让无数人为之共鸣。“穷孩子没有春天”——据《南方周末》报道,“出身越底层,上的学校越差”,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。如果连打工子弟学校都要关闭,寒门难出贵子不是必然吗?穷孩子没有春天又何奇之有?

受教育是适龄孩子不容剥夺的法定权利;保障适龄孩子接受义务教育,也是政府部门不容推卸的法定义务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,更被写入了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。有论者建议,对那些让孩子流离失学的官员,应保留追诉的权利!这绝非无理取闹!

■本版投稿邮箱:zhangjinling@qlwb.com.cn